

听作者说

茅奖得主谈获奖作品

宋庄

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近日尘埃落定,格非《江南三部曲》、王蒙《这边风景》、李佩甫《生命册》、金宇澄《繁花》、苏童《黄雀记》5部长篇小说夺得桂冠。本届茅盾文学奖得主获此殊荣,会有什么感受呢?

《江南三部曲》:记录当代的精神生活

有时像又密又急的秋雨滴落无边的湖面,有时像飘扬的雨丝遮掩参差的屋宇,格非的文字,带着一种淡淡的忧郁和优美的诗韵,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江南小镇弥漫的雾气。从《迷舟》、《褐色鸟群》及至《欲望的旗帜》,格非所编织的故事四溢着游戏且无序的“弥天大雾”,甚至被定性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玄奥的作品”。

但是到了《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格非缓慢且从容地沉浸于语言的古典意境之中。尤其《春尽江南》的完成,“乌托邦三部曲”划上了句号,格非的写作如同绵绵春雨的间隙,出现了灿烂的阳光,由虚幻走进现实批判。很多人说被作品深深地触动。“我个人的判断,希望通过《春尽江南》来表现、记录当代的精神生活,也尝试在叙事上有新的变化,使得它不要有太高的语言文字上的门槛,使得叙事更清晰一些。”格非说,原来作品中的很多迷雾,现在正慢慢拨开。

《这边风景》:79岁与39岁对话

“我找到了,我发现了;那个过往的岁月,过往的王蒙,过往的乡村和朋友。黑洞当中亮起了一盏光影错落的灯。”

《这边风景》是40年前的旧作,但他不想对这部旧作做过多的改动。“第一我没有这个能力,第二就会使那个时代的很多时代特色



听说,这届茅奖作品都很好看



“回应”传统文化

陈俊宇

格非的江南三部曲分别是:《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

美国马里兰大学亚洲与东欧语言文学系副教授刘剑梅说,《江南三部曲》是有历史有当下,前两部是历史,而且格非主要是对中国乌托邦的实践做了一个反思。《人面桃花》从晚清乌托邦开始反思,到了《山河入梦》是革命时期和新中国以后的乌托邦反思。所有的反思都指向灾难,而灾难的最大原因就是集体的乌托邦,思想统一化,不重视个人的权利和尊严,不能容纳差异性的思想。然后到了《春尽江南》开始写当下,在里头看到了一些庄子的东西,做一个无用者才能不被所用。

书中的故事和人物都取材于江南腹地,对格非而言,“江南”不仅仅是地理名称,还是一个历史和文化概念。

“我对大的时代没有太大的兴趣,大不了是一个历史的框架,我感兴趣的是人,而不是一般的人,是那些在时代变化当中被迫卷进去的人,或者是一些不幸的人,他们不能应付生活,缺乏自信,比较脆弱。”格非的这番话,在《江南三部曲》的封面得到印证,“再现剧变时代个体的梦想与挣扎,选择与无奈”。

创作三部曲始源1994年。到《人面桃花》动笔,已经是2003年初春。再到2007年《山河入梦》出版,又过了5年,《春尽江南》才姗姗到来。

1994年前后,是格非一度中断写作的开始,时间长达近10年。在此之前的1987年,他发表成名作《迷舟》,从此以“叙述空缺”而闻名于“先锋作家”之中。

然而,“80年代结束了,90年代之后,中国的市场化非常快速地膨胀,很多的中国作家都不能适应,需要重新寻找自己,我也不例外”,格非坦承缺少写作的动力,有新旧世纪交替的迷茫,也有伤感,太过迅速的变化,有些价值和信念的摧毁,让他还不习惯。

格非的重新露面,就是江南三部曲之《人面桃花》和《山河入梦》,风格早已褪去“先锋”色彩。那鲜有作品的十年,格非在“补课”,从现代主义到传统文学、古典美学的回归。因此他说,《江南三部曲》不是“撤退”,也不是“突破”,而是“回应”传统文化。

在《春尽江南》的结尾,作者写道,“在当代时代,只有简单、朴素的心灵才是符合道德的。”一切如是,于是读之。

清蒸鱼中段独好

吴迪

喜欢作家王蒙的人都知道,他有一段“清蒸鱼中段”的说法。他在后记里提到“重读旧稿,悲从中来”,心情复杂。笑称在这部小说中找到了38岁到47岁的自己,就好比一条清蒸鱼找到了自己的中段。

他的人生经历颇具时代典型特征。年轻时是不幸的,处在反右、文革的大背景下,因作品《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被扣上“右派”的帽子“发配边疆”。但他又是幸运的,在新疆与边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点滴生活融入新疆少数民族的生活中,为该小说的创作铸造了血肉灵魂。当他重新回到我们视野,“往远里说,城市写作被边缘化很多年,否定城市的意义,但人们却都进入城市,它一直被评论为腐朽的温床,尤其上海,一直被批判,或给出种种简单化的定论,比如上海的历史很短,原先

童年时的记忆已经碎片化了,却因为打小儿的浸泡,使李佩甫无比地怀念,即便那碎片化为风,也是有颜色的风,带沙味的风。这使他清楚地意识到,虽出身于工人家庭,在小城市长大,他的根,扎在平原。他写了最普通的植物,写了赖以生存的土地。

在这部“内省书”的创作过程中,他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指甲里开花”的感觉,痛快

探寻时代与精神的关联

齐峻

李佩甫在《生命册》的扉页上写了泰戈尔一句话:

“旅客在每一个生人门口敲叩,才能敲到自己的家门;人要在外边到处漂流,最后才能走到最深的内殿。”在本约38万字的小说里,李佩甫力图展现的是一个时代与生活在其中的人的精神世界的关联。

书中的“我”是从乡村走入省城的大学教师,想完全脱离家乡无梁村的喜怒悲欢,却发现自己无处可逃,来自乡亲们的请求让“我”心力交瘁,更因无力帮助他们而羞愧。于是,“我”跟着大学同学“骆驼”下海。不同的是,“骆驼”在城市追逐欲望和贪婪的声浪里迷失了;而“我”一直坚守道德底线,以致没有完全迷失。尽管彻底摆脱农村的想法始终盘旋在“我”的脑海,但在生“我”养“我”的无梁村,始终有“我”挥之不去的记忆。

《生命册》中还塑造了其他几个无梁村的人物,深陷家庭矛盾不能自拔的老姑父,无休止上访的梁五方;为拉扯三个孩子而沦为了小偷的虫嫂;在乡人的闲言碎语中自宫的能手春才……

对于这些人物,作者有批判,更有人性的关怀。而对待这些人物的态度,实则也映射出李佩甫对新旧杂陈的乡村社会的态度:他不仅延续了乡土文学中批判和改造国民性的传统,又杂糅了类似沈从文、废名、汪曾祺等作家作品中皈依乡土的情感诉求。

人们习惯于将李佩甫归结为乡土作家,从《羊的门》《城的灯》《等等灵魂》到今天的《生命册》,乡土题材确实也一直是李佩甫钟爱且擅长的类型。但是《生命册》又有所不同,该书以全面、多元的视角关注那个飞速发展时期的各种历史真实,并以乡村作为城市的背景,描述了新“城市人”在大都市艰难坎坷的心路历程;同时以一个“城市人”的角度,珍视着来自乡村的原始人性。借助“我”和“骆驼”之眼,城市商海的浮华也如浮世绘一般展现在人们面前。

《生命册》中的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如此矛盾而又不可分离:“我”在追逐城市现代文明的同时,却始终难以割断与无梁村的血脉联系。在“官场”和“商场”中变异的人性,又始终难舍原始乡土的对照。

李佩甫继承了乡土叙事中关照现实的传统,但他也并没有妨碍他对乡土叙事的超越。乡村与城市生活的双重体验,现代派和后现代派双重的影响,在书中都能窥得一斑。正如书中的“我”难以割舍的乡村记忆一样,作者试图给浮华的城市及喧嚣的时代寻找一个根植大地和农业文明的精神家园。

听评委说

彭程:光明日报文艺部主任,1986年开始发表作品。199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第八届、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委。



获奖作品评委怎么看

本报记者 苏墨

记者:您怎么评价这几部获奖作品?分别介绍一下好吗?

彭程:《这边风景》描绘了新疆大地上汉、维族人民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的真实生活,以及两族人民的相互理解与友爱共处,是对生活的激情讴歌。作者对少数民族的情感和文化有深刻的理解,塑造了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王蒙作品机智幽默的风格,在这部写于上世纪70年代的作品中已有突出的体现。

《生命册》描绘出身乡村的知识分子在城市中的际遇和沉浮,以犀利的批判姿态,展开了对社会和人性的深入剖析,探讨了传统与现代、生命与土地的关系,表达上既坚实饱满又诗意弥漫。《江南三部曲》的背景跨度长达一个世纪,描绘了几代知识分子的灵魂状态,精神世界的嬗变,在社会风云的变幻中探讨了人和时代的相互作用,文本上保持了格非一贯的优雅和从容。《繁花》妖娆、琐细而精致,用精短的方言对白,写出了上海的人、事、城的独特的韵味和情调,刻画了庸常生活中万千形态和无穷滋味。《黄雀记》仍然以作者作品中多次出现的南方城市的香椿树街为背景,写出了小地方中的小人物,写出了少年青春的残酷、市井生活的百态,涉及了罪与罚、沉沦与拯救等命题。温润的语感、奇诡的想象、丰富的隐喻,在舒缓细腻的叙述中慢慢展开。

记者:很多人说,此次茅奖更像是奖给作家而非作品,您怎么看?

彭程:根据茅盾文学奖评奖条例,茅奖是

“褒奖体现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思想高度和艺术水准的优秀作品”。说得很明确,是评作品。因此评奖首先看重的是作品本身。一部作品如果的确足够优秀,有着鲜明卓异的艺术特质和审美风格,是不会被漠视的。这次《繁花》的高票获奖,充分印证了这点。作者金宇澄是一位文学编辑,作为作家此前并不广为人知。

但另一方面,作品是作家写出来的,二者是密不可分的。文学创作是一个漫长的、不断进步的过程,一个作家写出好作品,往往都是经过多年的积累的,在这个修炼的过程中本身也成了知名的作家。因此这次茅奖评比和往届一样,大多数获奖作品的作者也是著名作家。王蒙、格非、李佩甫、苏童,每个人都是如此。因此,我相信“好作家、好作品”会是几十位评委在评选中普遍遵循的一个尺度。一位优秀作家,因为写出了优秀作品,而最终获得了茅奖——我想这样描述二者的关系,可能比较准确。

记者:提名作品中您还有哪部推荐?

彭程:因为整个评选过程是公正、严格的,因此这次获得提名奖的10部作品,我认为都是这四年中堪称优秀的作品,思想性、艺术性上各有千秋。但茅奖评选最多只能推出5部,必须舍弃另外五部,因此评委们要在这个规则下进行一些必要的妥协,更多地凝聚共识。并不是说未能获奖的几部,就一定比获奖的差很多。越到最后的环节,作为评委越感到取舍之间的犹豫和纠结。

即便是未能进入10个提名行列的作品中,也有不少是很不错的,如刘庆邦的《黄泥地》、宁肯的《三个三重奏》、严歌苓的《陆犯焉识》等等,我都很欣赏。

兰德华

作为新先锋文学的代表,苏童以中短篇小说成名,其中《妻妾成群》几乎成了他的代名词,被改编成电影《大红灯楼高高挂》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后,其作品开始获得国际影响力,特别是在法语世界。而这次小说《繁花》中的折桂,结实地证明了继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米》以来,其驾驭长篇的功力。

小说讲述了一桩上世纪80年代发生的青少年强奸案引发的命运纠葛史。香椿树街鼎鼎有名的纨绔子弟柳生强奸少女,却让普通少年保润替其坐牢。最终,保润杀了柳生,这是个悲剧,有关血色的荷尔蒙,有关青春的罪与罚,有关自我救赎、绝望与希望。“黄雀”,暗喻“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小说属于“香椿树街系列”作品。正如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正如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郡”,苏童有自己的“香椿树街”。他说:我们这一代人,从小生长的街区逐渐消失、倒塌、霉变,所以我想通过创作小说造一条街,这条街是看世界的窗口,我希望它和世界一样辽阔、悠长、宽广,即使时代变迁,也永不消逝。

在苏童的“香椿树街”,长篇小说《黄雀记》无疑成了“地标性建筑”。

故事取材于苏童童年时代邻家男孩卷入强奸案入狱的真实事件。正如他一贯的主张和坚持:作家应该好好利用童年的记忆。童年记忆,之于苏童,即成了文学创作的源泉,也成了一种文学的视角。

江南的“香椿树街”:潮湿阴郁的意象,是苏童与故乡情感的对立与矛盾。“一群处于青春发育期的南方少年不安定的情感因素,最终降临于黑暗街头的血腥气味,一些在潮湿的空气中发芽溃烂的年轻生命,一切徘徊在青石板路上的扭曲的灵魂……”其实,在他的短篇小说集《少年血》中早已埋下了《黄雀记》的伏笔。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也是苏童的自我写照,更是他对现实与生活的理解。在螳螂捕蝉般的生命争斗背后,永远有一只为小说家静待捕捉一切的黄雀。而苏童的这只“黄雀”,则是比他笔下惯于描写的“小人物、小地方”更大的时代与社会。

苏童的作品基调是悲观的,他的文字间有种江南的潮湿和幽暗。生命的堕落与斗争,错乱与癫狂,这一切发生在女性化的江南,这唯美的景象包围的人世,却发生着丑恶而残酷的事,事关生死。

木心说,悲观是一种远见。而苏童的“黄雀”正是这种远见。

(李法明漫画)

